

四库研究的当代价值

□ 陈晓华 李沛恒

近代以来，在与世界接轨中，我们丢失了不少本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系统，我们需要追本溯源。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提到《四库全书》。

四库承载了中国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

四库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图书分类名称。自西汉刘向奉诏整理书籍，书目著录就不仅仅是为了记数之需，而有“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功用。它以目录的形式概括中国古代学术简史，以分类体系和取舍方式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各门学术源流及传承关系，介绍作者事迹、图书内容、价值高低。有提要者，更以提要反映当时学者校勘、辨伪和考据成果，反映当时学者在各门学术中的学术批评思想和方法，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四部分类独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学术变迁史，是以四部分类为主流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建构史。所以，四库承载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完成了指引读书治学，学术导向，领航思想的重任。

四库研究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顺序及其名称确立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隋代。最近的源头则是清乾隆时期，即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名称之时。乾隆曾说：“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以四库与全书命名自己亲自把关的御纂书籍，意在以四库体系，汇总当时古今中外典籍，永昭艺林盛轨。亦即通过四库与全书的合一，重新全方位整合典籍，使“治统”与“道统”合一。其实显示出有关四库著述及其研究已蔚为大观，足可支撑起一门学问。

由上可见，四库研究虽然起于《四库全书》，但以《四库全书》典籍集成的地位，以及乾隆为之命名的寓意，四库学研究实又不仅止于《四库全书》本身。因此，四库学研究，完全可以从广、狭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四库研究，理所当然仅指《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理论等研究。广义的四库研究，则完全可以凭借《四库全书》四库代表的身份，容括它所涵盖的经史子集所有文献，涵盖中国传统各种学问技艺等，以及在这个体系下所体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

所以，四库研究不只关乎《四库全书》本身，而且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囊括入四库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引读书治学门径，宣德达教。这样既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色，且使之系统化，便于学习，利于传承。

四库研究的内涵

四库研究至少应有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即从文献学、图书馆学角度展开广狭两方面的研究；二是拓展层面，即以文献学为本，结合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等，从广狭两方面，展开跨学科跨国界研究。

基础层面的研究，既要注重《四库全书》本身的研究，如纂修、考校、比勘、典藏等，又要加强其传播实践研究，如《四库全书》的抄写、四库本的整理等。

抄写，其实是中国古代童蒙授课方式之一。先生教授小孩读书，除了背诵外，就是抄写。抄写到一定程度，其义自现。而且抄写更利于深刻记忆。苏轼就抄书，有友人访他，他半天不出来，原来是在抄《汉书》。书抄多了，词汇量就大了许多，下笔如神就是这样抄来的。我们的词汇量比古人少了许多，哪里能下笔如神。要达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抄和诵是缺一不可的。

又如四库本的整理，比如为四库本典籍重写提要，就是对四库本的一项重要整理工作。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知晓如何入优秀传统文化之门，而典籍提要恰可完成这项任务。亦即如何分门别类阅读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如何读，读的先后顺序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典籍传承情况等，都是提要可以解决的。因此，重写四库提要意义重大。

拓展层面，也要加大研究力度。比如，四库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重大，地位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向国人讲清清楚的。此外，还可以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全球化视野下的四库研究，进行跨国界比较研究，摸清域外四库研究现状，最大限度发挥《四库全书》文化使者的使命。

北洋政府徐世昌时期，影印的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文溯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就被徐世昌委托朱桂辛携至欧美各国及日本赠送各国元首及其各大学图书馆。1935年，以文溯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被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又如厘清四库研究与国学之间的关系、做四库研究发展前瞻等，有的还是全新领域，亟待开发，研究前景大好，研究空间广阔。



而四库研究队伍，可以包括文史哲三家成员，甚而工艺美术建筑农工医药等研究人员，都可以囊括进来，不划圈子，不设禁区，不立门户，欢迎所有有志者。

四库研究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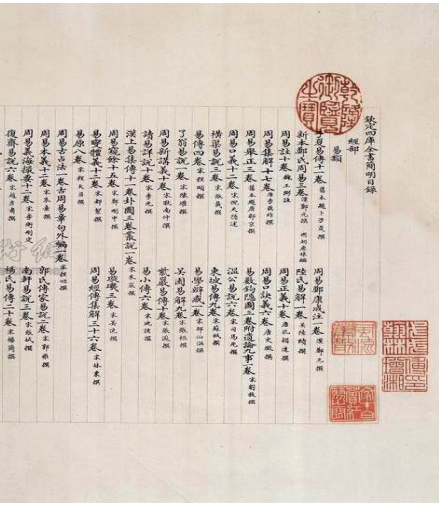
首先，提倡四库研究，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世界记忆的需要。四库学研究具有丰富的文献基础，所包含的记忆遗产不菲。《四库全书》本身就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真实独一无二、具有世界性、时代性、地域性、人文性、社会性、珍稀性、完整性等世界记忆遗产特性的文献。

面对目前需要构建文化自信，夯实民族思想根基的现状，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其中第一要义就是阅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而《四库全书》正是经过删汰后的典籍总汇，且在它之前问世的《四库全书总目》等正是指导读书治学的良径。由此，实可得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且今天，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文溯、文津、文澜、文溯四阁了，保护弘扬刻不容缓。

其次，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中国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屹立世界，我们需要输出具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文化，方可最大限度彰显中国本色。我们传统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的主流就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因此把四库学中的记忆遗产推向世界的同时，无疑也是在推广尤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古典文化。

再次，是传播普及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如何传播普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可供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成例。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建构。我们可以尝试从古典文化体系中挖掘养分，结合当今实际，得出可以推行的方案，并加以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加以跟进，通过学科培养传播普及者。而四库既是古典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又承载着传统学科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如果以此为切入口，借鉴前贤今人的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得到行之有效的传统学科体系的。

有所思



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

清朝建立之初，在赋税征收方面，废除了明末的各种苛捐杂税，“明季一切累民之政，既尽予黜革。征之有则，取之有经，不惟踟蹰之诏，史不绝书”。至顺治十三年（1656年），“各州县开征（地丁钱粮），预颁由单，定于十一月初一日颁发”。

康熙年间，丁银征收的混乱与弊端，促使朝廷不得不进行改革与整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朝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重大决定：“今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增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所以“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这一决定以豁免新增人丁丁银的方式，避免进一步激化丁银征收中的矛盾，并为其后摊丁入亩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它以法律的形式宣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省开始实行摊丁入亩，其他各省也纷纷效法。“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以各色丁粮，均摊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昭画一，以垂永久。”雍正末年，除个别省份外，赋役制度中的这一重大变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使中国古代延续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被取消，赋役内容大为简化，以地为标准征收赋税派徭役，减轻了无地少地贫农的赋税徭役负担，使财税征收制度更加合理。

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匠价亦向系另征。乾隆三年（1738年）奉旨，均摊入本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由是地丁匠价，统归一制，真所谓一条鞭矣”。至此，清代的赋税制度改革基本完成。

摊丁入亩实施中的复杂情况

从总的说来，清代的赋税征收中以田赋最为重要。摊丁入亩后，地赋与丁银合一，故又称地丁银，是为正赋。地丁银按亩征收，由于各地田土肥沃贫瘠不一，所以在征收时，先得区别田地山荡，然后再分等则，即通常所说的三等九则。同样是上则田，此地和彼地的征收额也不尽相同。另外，不同的田土类别，如官田、民田，科则也相差较大。田赋有征银和征实物两种，实物包括米、麦、豆、草之类。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以及山东、河南等省份，在正赋之外，还要征收米、麦、豆等漕粮。关于地丁钱粮的征收情况，据黄六鸿《福惠全书》的记载，各地差别还较大，有的地方统一征收地丁银，有的地方则仍加征各种杂税。

清代赋税政策和管理进步

□ 方宝璋

除此之外，州县经征钱粮，在时间上每年分为上忙、下忙两季。上忙定2月至5月、下忙定8月至11月征收，这是根据农业中夏秋两收而规定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差别大，所以各省征收时间又有所不同。如福建下忙开征于7月，山东、河南及安徽庐州、凤阳两府并颍、泗等州则开征于6月。甚至同一个省份，各州县开征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如浙江省规定，宁、绍、台、金、衢、严、温、处8府并富阳、昌化、嘉善、平湖、安吉、孝丰6州县为2月开征，6月停征，8月接征；余下17县为2月开征，清明后停征，6月补征，7月停征，8月接征。

从以上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摊丁入亩虽然大大简化了田赋征收的手续，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还是颇为复杂的。

其一，由于田地肥沃贫瘠不一，征收前首先要把田地分为三等九则，然后再按不同的等级征收不同数额的田赋。其二，田赋征收的东西、名目也较繁杂。其三，在每年开征之前，必须预先编制、刊定《赋役全书》、“易知由单”作为征收数额的依据。其四，各个地方开征、停征、接征、补征等时间不尽相同。

完善征收做法的建议

对于征收地丁钱粮中的弊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有清醒的认识，纷纷提出自己的改进主张。孙嘉淦在乾隆七年（1742年）上《办理耗羡疏》，指出当时由于朝廷没有明确规定在征收赋税之外要加征多少耗羨，没有制定支用耗羨的章程，因此导致地方不法官员任意私征，科敛百姓，并将私征到的耗羨用于向上司送礼，中饱私囊，使官场腐败。针对这种弊端，他主张朝廷应明确规定各省所征耗羨之数量，征收到官后全部存入省城藩库之中。这样征收耗羨有明确的额定数量，官吏就不敢多征收了，实施的结果是，比之前未规定征收数量时减少了很多，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耗羨征收到官后，一半用于官吏养廉，一半用于地方办理公务费用。这就使上司不敢向下属索取，地方办公费用也有着落，也不敢向百姓摊派。总之，这对于民生、吏治，都是有好处的。

赵廷臣曾上《请定催征之法疏》，指出当时“催科无法，其弊有八”，但其实质上都可归结为朝廷任人不当和没有制定适当的法规、制度。他指出，催科征收税粮，朝廷既要任人得当，又要制定适当的法规制度。如任人不当，而单有法规制度，那也有一半的效果。各级地方政府如能依照法规制度行事，再加上官吏精勤、明敏，按册籍如实征收，州县流水红簿，都报送府级政府印发，将征收通知书“易知由单”发放到穷山深谷每家每户，就能杜绝官吏营私舞弊、失取勒索等弊端。他建议地方督抚应留意各级官吏的催科征粮工作，对

在催科征粮中能对民众使用约定、爱护、鼓励、帮助方式的官吏，给予奖励，这样就会使从事催科征粮的官吏，在工作中留心民生疾苦。

赵廷臣在征收地丁钱粮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可贵的政府管理理念：政府对于催科征粮，不能采用鞭打、夹指等刑罚逼迫百姓交纳，应该针对不同的催科对象，分别采用约定、爱护、鼓励、帮助的方式，这样才能把催科与爱民、化民、助民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征粮之前，就应该预先与百姓约定，百姓在交完该交的赋税后，没有再额外添加的耗羨。这样，就会使百姓放心，及时交纳税粮。在催科征粮时，禁止有关官吏骚扰百姓，向百姓索取酒食等。这样，百姓就会自觉交纳税粮。对于富裕农户交纳税粮，如他们按时交纳，就用花红鼓励将交纳者送出县堂；如是绅士大户按时尽数交纳，就送给他们匾额，这样，就会使富户、绅士大户争先恐后前来交纳。如对于贫穷小户，政府则要帮助他们出售谷帛、鸡豚，或采用通融的办法，使他们因感戴政府的帮助而完成交纳税粮。

上古先民的不死遥想

——画卷开时塞外云（一）

□ 童泳洋

在神话传说里，西王母频频出场。根据我们的一般想象，她是位高贵而古老的神女，因此她的最初形象可能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只长着老虎牙齿、豹子尾巴并且时时长啸的穴居生物，不仅与仙气飘飘、雍容华贵毫不沾边，甚至可以说是凶神恶煞。后羿当年也并不是来到了预想中金碧辉煌、如梦似幻的天宫阆苑，而很有可能是到了一个原始的山洞里。面对如此凶神，后羿还能求到不死药，实在是具有大毅力。不过这也难怪，长生不老是人类自古有之的梦想，不死药的传说从未断绝。许多帝王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它，派人四处求仙。尽管世人都知昆仑山有不死药，可唯有后羿真正地求到了，因为从始至终只有后羿一个人登上去过。那么昆仑山到底是怎样神奇的一座山，它又在哪里呢？

在中国有两座“昆仑山”，一座是地理上的昆仑山，另一座是神话中的昆仑山。地理上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的东部，横跨新疆、西藏，向东一直延伸至青海，一小部分的余脉甚至进入四川境内，占地足有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最高峰是位于新疆乌恰县的公格尔峰，海拔超过7600米，“巍峨昆仑”当之无愧。

在古生代末期，昆仑山的形态已渐渐成型，在西北内陆的土地上静静地矗立。

地理上昆仑山的显著变化是以百万年为尺度的，而神话中的昆仑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神话是具备想象力的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叙述方式，所以当人们的叙述出现变化时，神话及其衍生物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异变。而人的想象力和叙述又是最不可捉摸和容易失真的，昆仑山的形态便是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完善和清晰起来的。《山海经》中记载了昆仑山最初的形态：昆仑虚方圆八百里，高达万仞。山上生有五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高、五围（双臂合拢的长度为一围）粗的巨木大树。山的四面各有九口井，井栏用玉制成。同时每一面也都有九道门，由一种叫开明兽的神兽守护，里面居住着众多神灵。此时的昆仑山神话初具雏形，只是拥有了成为神山的基本要素，尚处

于“混沌初开”的状态。《淮南子》中，原本“混沌”的昆仑山开始拥有了秩序。昆仑丘有九重增城，在这之上依次是“登之不死之凉风之山”“登之能使风雨的悬圃”“登之成神的太帝之居”。不仅层次鲜明，上面的居民同样分为不同等级，愈往高神通愈大，地位愈尊崇。这是人间文明走向有序化、规范化而在“神话”领域的投射。但昆仑山的“进化之路”仍未停止，到了《博物志》里，它再度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地下有四柱，柱广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轴，犬牙相举。”昆仑山的描述维度不仅由地上世界向地下世界延伸，而且由静态变为动态。大地由紧密相合的三千六百根轴带动着不停旋转，轴的核心便是昆仑山，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举。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话流变的过程中不止是昆仑山的形态发生了变

化，它的位置也出现了显著差异。早期的昆仑山位于“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是遥不可及的边远荒僻的地方。而人神殊途，仙人居住的神山不可能在能轻易到达的人境，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把它放到距离自己无比遥远的地方。或者说，正因为无比遥远、罕有人至的神秘和未知使山神化。如果以人为中心，神山自然就是在边远之地。后来神话的宗教色彩加重，神灵的权威增强，人们渐渐以神灵或者整个天地作为描述的参照物，昆仑山就“被移动”到了天地的中心。

正如前文所言，神话并不是一个稳态，它自诞生之初便处于嬗变的“重写”。这种“重写”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依赖全新的创造，并将新质填充入旧有体系，使其更加完备；另一种便是不同神话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人们会把一种神话里的某些特质吸纳进另一种神话里，而后者

是更常见的方式。世界上很多民族和地区的神话都具有诸多同质性内容，除却人类心理某种程度的共通外，神话间的“相互剽窃”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在中国同样找得到例证。中国古代有两大神话系统，一是昆仑系统，一是蓬莱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后来道教神话的基础，是许多神话的发生地。起初这两种神话是相互独立的，前者源于西北内陆神话体系，后者源于东方海洋神话体系。而汉武帝的举动使这两条平行线出现扭曲变形，最终发生了交集。此前虽然昆仑山早有人得到了不死药的神话，但东部沿海国家的君王如燕齐的国君却纷纷向东海蓬莱求药。他们由于国土所限，对昆仑知之甚少。何况眼前既有蓬莱，也不会舍近求远。

但汉武帝时这两个神话的发生地都进入了汉朝的势力范围，情况便大不相同。汉武帝一生汲汲于求仙问道，渴望长生不老却屡屡失望，不甘

心的他自然会遍试所有可能的方法。汉武帝早年对昆仑山极感兴趣，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即以汉武帝为主人公，赋中对“武帝游昆仑仙境”进行了详细而精彩的描写。但是昆仑山并没能满足武帝的愿望，因此武帝多次派人出海找寻蓬莱仙岛，甚至亲自来到东海巡游。此后，关于昆仑山的描述出现“下狭上广”的字眼。常识意义上的山都是上狭下广的，即使是世界各地神话传说里的山大多也符合这一规范，那么昆仑山为何会出现如此特殊的变异呢？原因在于蓬莱神话。蓬莱三神山平时位于东海之上，但如果有人靠近，“三神山反居水下”。而山居水下的情形既有可能像现在的海底山脉，但还有一种更为可能的情形，即神山隐去，唯余水中倒影，可望而不可即。而山在水中的倒影，正是下狭上广，这应当就是关于神山形态独特想象的现实根源。而汉武帝对蓬莱的重视又明显高于昆仑，所以前者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后者。后人在面对这几个神话文本时，便会产生“既然都是神山，便具有共通性”的想法。而三神山又是主流认知，以它们为蓝本改造昆仑山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